

愧对冯其庸先生

苗怀明

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,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,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。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,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,但每次都印象深刻,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,一直心存感念,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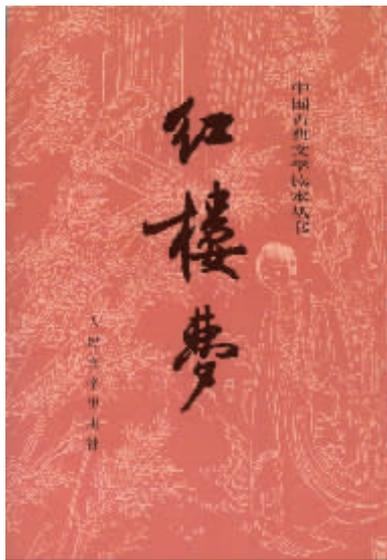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题目已经萦绕在脑海中十几年了,其间曾几次想动笔写出来,直到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才下决心形成文字。

事情要从1998年我博士临毕业前一年说起。

我硕士、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都是元明清文学,重点在中国古代小说,但结识冯先生并不是因为专业问题,而是为了找工作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未出校门的年轻学生,冯先生则是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,他主持校订的《红楼梦》印数超过500万册。尽管早已拜读过先生的多部大作,但一直没有当面谈听教诲的机会。得以结识冯先生,还是经过朱玉麒兄的介绍,他和冯先生是往来密切的忘年交。那时候临近毕业,一边忙着撰写毕业论文,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。当时工作已经相当不好找,尤其是留在北京,正在焦头烂额、没有着落的时候,玉麒兄偶然提起,说他听冯先生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那边可能需要人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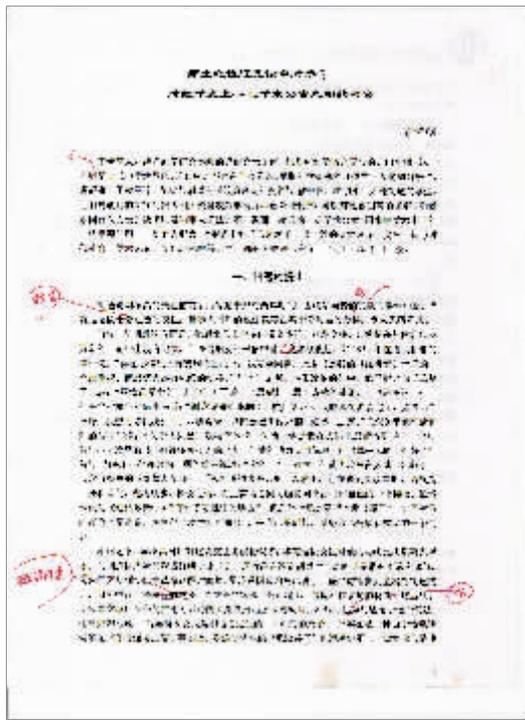
听到这个消息后,很想去试一下,遂请玉麒兄帮助引荐,托他将自已发表过的几篇小文章转呈冯先生,请其指教。本来是病急乱投医,没有抱什么希望,没想到冯先生读过小文之后,对我还算满意,并很快付诸行动。当时红楼梦研究所虽然需要人,但没有进入指标,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为此冯先生亲自出面,找文化部相关领导说明情况,经过一番争取,这才算是获得进入指标。考虑到这份工作收入太少,冯先生还托朋友帮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住所,房租很低;还说到时候可以参与《红楼梦学刊》的编务工作,每个月会有一点补贴。先生如此热心帮助一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,且考虑得如此周到,当时激动的心情已无法用感谢一词来描述。

随后,玉麒兄带我去拜访冯先生,去的是先生在通县张家湾那边的住所。那时候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,基本上是他讲我听,内容主要是指导我如何做学问,将来如何在单位工作,并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。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,但



冯其庸先生校注的1982年本《红楼梦》↑

冯其庸先生为作者批改文章→



印象深刻,除了冯先生的谆谆教诲外,还有其满屋子的藏书与字画,真是大开眼界。当时冯先生的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一书刚出版,他还签名惠赠了我一本。

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,工作算是基本定下来了。此后好事多磨,起了变化,当然责任全部在我,无可推卸。由于个人的原因,尽管已经找好工作,但经过反复思量,觉得还是离开北京为好。于是在冯先生帮助联系工作的同时,我又私下里联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,准备去做博士后。博士后的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,我决定南下,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玉麒兄。玉麒兄随后转告冯先生,冯先生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: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,觉得受了我们的骗,说我们利用了一个老年人的善良。弄得玉麒兄很是难过,我自然是更为愧疚,一是觉得对不起冯先生,二是觉得对不住玉麒兄,让他因为我的事情受到连累,影响他与冯先生的关系。

后来冯师母帮我们开脱,说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,除了学业,还有生活上的顾虑。两个年轻人虽然做事莽撞,但情有可原。经过劝说,冯先生止住了怒火,勉强接受了我们的道歉。现在想来,当时真是太年轻了,也太鲁莽了,考虑事情不周全,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当时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给冯先

生,和其商量一下,让他帮助拿拿主意,也许能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,比如先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一期博士后,两年后再回北京工作之类,至少让先生有个思想准备,不会觉得那么突然。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,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,不仅让冯先生白忙乎一场,而且还浪费了一个珍贵的进入指标,内心除了愧疚,还是愧疚。至今见到张庆善先生,他每次都会半开玩笑地批评我,说我当年不够意思,放了红楼梦研究所的鸽子。

这种愧疚是终生的,也是无法弥补的。1999年7月,我到了南京大学,师从俞为民先生做博士后。稍后,卜键先生在南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,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请冯先生做答辩主席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先生,在答辩之前,我很忐忑地上前打招呼,他只是对我点了点头,没有说什么。我心里满是愧疚,也没敢再多说什么。

2005年,我读到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一书所收胡适与周汝昌的往来书信,发现书信内容与周汝昌先生的相关回忆反差极大,颇有感触,遂写了一篇长文,回顾两人之间的交往,还原一段历史事实,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小文初稿写出后,因话题重大且相当敏感,心里没底,便呈送几位自己信得过的学界前辈,请

他们帮助把关,其中包括我的导师张俊先生、南大中文系的董健先生、江苏社科院的萧相恺先生,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先生。虽然知道冯先生与周汝昌先生之间曾有一些不愉快的误会,但为慎重起见,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,经和玉麒兄商量,遂也给先生寄了一份。

冯先生看到小文之后,并没有急于表态,而是先问我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一书的情况。因该书印量很小,不容易看到,他想购买一套,核实一下相关资料。等费了一番周折,看到原书之后,他才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先生看得很仔细,批改虽然不多,但都很中肯,主要是对小文字句的不妥之处进行批改,比如笔者认为胡适与周汝昌两人是“争吵”,先生改为“争执”。再比如笔者指出从建国之初到“文革”这段时间里,周汝昌在谈到胡适时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谩骂的话,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,先生将“违心的成分”改为“政治因素”。对这些批改意见,我大多采纳了。

小文征求了几位学界前辈的意见、修改过几次之后,在《新京报》发表,后又收入《风起红楼》一书,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,其中有正面的鼓励,也有反面的批评,周汝昌先生的家人为此要起诉我,差点引发一场官司。小文发表后,我从网上看到一些批评,

说我的目的是为了出名,受人指使,动机不纯,为某人充当打手之类,对于这些指责,我一概不予理会,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,大多为想象臆断之辞,不值得回应。冯先生不因为我当初的草率鲁莽而介意,反而热心帮助我修改文章,至今想起,仍感动不已,内心的愧疚又增加了一分。

此后因冯先生年事已高,身体也不太好,不忍心打扰,就再没有和他有直接的联系,只是不时从一些朋友那里或报刊、网络上得知先生的消息。每见先生有新出的大作出版,或购藏拜读,或在自己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网上进行推介。2010年,适逢冯先生米寿之喜,相关单位举办庆祝活动,准备出本论文集,玉麒兄帮忙征集论文,我奉上小文一篇《红学史上的关键一环——论近代红学研究》,算是为先生祝寿。论文集名为《国学的传承与创新: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年庆贺学术文集》,厚厚两巨册,不知先生是否注意到我那篇收录在红学研究新视野专辑中的小文。

转眼到了2017年1月,有位朋友想出一本书法作品集,托我求先生题写书名,被我当即婉言谢绝,一则是多年没有联系了,不可能因为求字的事情冒昧打扰先生,二则是听说先生身体很是不好。谁知此事刚过两天,就听到先生仙逝的消息,深感悲痛,第二天在自己所办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一则先生新书《风雨平生:冯其庸口述自传》的消息,以表感激和悼念之情,当然也有埋藏在内心深处十几年的那份愧疚。

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,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,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。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,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,但每次都印象深刻,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,一直心存感念,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。这份基于感激的愧疚将永远留在心底,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。

(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副院长)